

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与粮食种植业退化状况分析

——基于闽赣鄂浙32村486户的调查

朱冬亮, 高 杨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农户种粮意愿弱化是指由于种粮比较收益降低、农业劳动力缺乏等因素引发的农户种粮积极性降低而导致农户粮食产出萎缩,进而引发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实地调查研究表明,最近几年,我国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呈加速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单个农户粮食产出下降、复种指数下降及部分农地抛荒等,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农业劳动力上涨及短缺、粮价过低、年轻农民“厌农”情绪扩张等,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地制度创新以改变这种局面,成为提升农户种粮意愿进而化解粮食种植业退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农户种粮意愿弱化;粮食种植业退化;实地调查

〔中图分类号〕C 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2013) 04-41-08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农地家庭承包制,至今已有30多年。在当今社会发展形势下,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否依然还能激励农户保持甚至是促进粮食产出增加?本文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农户生产的粮食占我国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0%以上,因此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保障有赖于千家万户农户保持良好的种粮积极性。^{〔1〕}事实上,在近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我国南方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日趋明显的农户种粮意愿弱化现象,其结果是导致粮食种植业退化。特别是在长江以南的稻作农区,这种退化现象显得更为普遍。^①接下来本文将以我们对闽、赣、鄂、浙4省32村486户农户的深度访谈及追踪调查为基础,以分析农村微观层面的粮食生产单位——农户的周期性经济活动为研究路径,探讨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原因。

进入本文主题之前,有必要对调查的村庄和样本户特征做一番必要的介绍和说明。^②我们调查时间为2009-2013年,调查地域涉及闽、赣、

鄂、浙4省32个村庄。其中,福建被选取的调查点有闽西北的J县、闽西的W县和闽南X市城郊3个县(区),共12个村;江西被选取的调查点有赣北的T县、赣南的X县、C县和赣东的Y县共12个村;湖北被选取的调查点有鄂西南的C县和鄂南的S县共5个村;浙江被选取的调查点有浙北A县的3个村。这32个村既有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也有地处平原地带。平均每个农户占有的农地在0.5-2亩之间。绝大部分被调查村周边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经济,村庄中的大多数农民要么耕作农地,要么外出打工经商,能够较好地代表当地农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至于被调查的486个农户,被访者大都是户主,年龄多在35-65岁之间。他们非常熟悉自家的农地耕作及粮食生产经营情况。

一、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与粮食种植业退化:概念的解释

探讨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议

〔收稿日期〕2013-08-08

〔修回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Z022)

〔作者简介〕朱冬亮(1971—),男,福建将乐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农村土地制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研究。

① 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无意断言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粮食种植业退化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也无意与全国粮食产量统计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只是把田野调查中所看到的现象如实地呈现出来。

② 调查由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包括高杨、李金宇、江金娟、谢冰露、崔云霞、王威等参与了课题的田野调查。

题,必须以对农户个体的经营行为进行细致的观察调查为基础。或许正是因为这点,学术界对农户种粮意愿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并不多见,自然也很少有人关注到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问题。本文所指的农户种粮意愿弱化是指由于种粮比较收益降低^{①[2-3]}、农业劳动力缺乏等因素引发的农户种粮积极性降低而导致农户家庭粮食产出萎缩,进而引发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客观地说,农户种粮意愿弱化是农户在面对外部市场和社会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农户基于个人及家庭自身的客观状况,在尽量保障家庭基本“口粮”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减少对粮食种植业的投入尤其是减少人力资本的投入,以换取其他替代性的高机会收益。农户种粮意愿弱化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单个农户生产的家庭粮食产量下降,虽然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整个农业产出及家庭收入的下降。

就目前情况看,由于从事粮食种植业比较收益过低,严重挫伤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如果有其他替代性收益,大部分农户可能会以粮食的家庭自给自足为底线,而把多余的农地和人力资本投资用于追求其他能够为家庭带来更高的货币收益的行业,除非他们没有更好的投资路径可供选择。^② 为了追求更高收益,不少农户要么是在保留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脱离农业生产而外出打工经商,其家庭承包地则留给家中的老人耕种或租赁给其他业者耕种;要么就是在既有农地上种植其他附加值更高的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包括种植蔬菜、烟草、水果等。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相比之下,粮食种植业退化趋势就愈加明显。

与农户种粮意愿弱化趋势相伴随的是粮食

种植业的现代转型。我们的调查显示,自2010年以来,由于城乡社会互动加强以及国家“三农”政策的调整,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趋势明显加快。主要表现为农地经营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升,粮食生产过程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开始逐步提高等。从很大程度上看,粮食种植业现代转型是现代化农业的发轫伊始。这种现代转型是在尽量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维持甚至是增加农地粮食产出。不过,从目前的实践中来看,和单个农户的精耕细作经营模式相比,部分地区采用机械化的农地经营模式的农地单位粮食产出整体上可能更低,并且可能与偏远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作的农地抛荒现象并存。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大幅度替代并减少劳动力投入,这样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非农产业,以获取更高的比较收益。

实地调查还表明,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与粮食种植业的现代转型两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在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农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转型。^[4]但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设想其实在很多农村地区并不符合实际,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供给使得大多数的农民工无法积累足够的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本,他们必须依赖自家承包的农地作为最后的一道“安全保障”。^[5]农地是外出农民“储蓄”在家乡的一笔用于保障生存的实物“资本”,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家的承包地,有的农户甚至连短期流转给别人承包经营也不愿意,他们宁愿暂时性抛荒。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粮食种植业退化和农业现代转型之间就出现了一个

① 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由农产品产值、农产品成本和农产品收益三类指标构成,其基本逻辑关系为“农产品产值-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收益”(参见唐茂华、黄少安:《农业比较收益低吗?——基于不同成本收益核算框架的比较分析及政策含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衡量粮食种植业比较收益高低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横向比较,即把粮食种植业与其他经济活动在成本收益方面的相互比较,是相同资源投入下获得收益的一种相对差异状况(参见刘建平:《农业比较利益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另一种则是纵向比较,即把不同时期的粮食种植业投入产出比进行比较。粮食种植业比较收益可以用成本利润率加以测量。我国不同时期的种粮比较收益高低与国家政策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户家庭粮食的自给自足大部分是以留守老家的家庭人口粮食消费需求为基准,而不包括外出部分家庭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

“断裂带”。这个“断裂带”的存在预示着我国农业发展中可能存在某种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

二、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农户种粮意愿高低主要通过农户粮食产出指标来衡量,而导致农户粮食产出下降的因素包括劳动力和肥料投入减少、农地地力下降、农业复种指数下降、农户种植其他替代性农作物等,这些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户种粮意愿弱化现象。事实上,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并不是今日农村社会才有的现象。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对27 56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零星分散的细碎化承包模式,不仅导致农地耕种方式的退化,有的地方甚至重新恢复了手工耕作。^[6]只不过,由于那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因此手工耕作实际上是对畜力或者机械耕作的替代,粮食产出并不会因此而减少。陆学艺在1986年就提到,当时我国农村已经面临着十一个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包括耕地迅速减少;水利工程失修;土地肥力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政策滞后;从事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负担逐年加重;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干群矛盾有所发展;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减少等。^[7]1988-1989年,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本省的10个固定观察点村子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和1984年相比,当时的浙江省农村的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了“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连年下降,耕地减少,复种指数下降,其深层原因是种粮比较利益的下降。这项研究还发现,当时的农户对于农地的情感是“恋土”与“厌土”并存。^[8]由此可以看出,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以及粮食种植业退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初露端倪。

而据我们的调查,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由此引起的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单个农户粮食产出降低

农户种粮意愿弱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单个农户的粮食生产量降低。在我们调查的32个村486个样本户中,有75%的农户的家庭粮食产量^①最高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初期,其中又以1983-1986年产量最高,之后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趋势。按照受访农户估算,和本户粮食产出最高年份相比,有75%的农户的粮食产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户均粮食产量普遍下降了2 000斤左右。在2009-2011年三年期间内,受访农户家庭年均粮食产量在3 000-8 000斤之间的约占65%。调查还显示,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其粮食产量下降的趋势越不明显。如相对贫困的赣南X县和相对富裕赣东的Y县相比,前者受访农户家庭粮食产量下降趋势相对更不明显,说明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户对粮食生产的依赖性更高。^②

以赣北的T县为例,该县是典型的南方山区农业县。2009年调查人员共随机入户访谈了该县4个村的80户户主。在这些受访农户中,自家有耕种农地的有68户,其余12户的农地已经全部出租给其他农户耕种,没有粮食产出。而在有耕作农地的农户中,2008年粮食产量在5 000斤以上的有30户,其中超过万斤的有9户,超过2万斤的有4户。受访的4个村中,最多的一户大户共雇工种植农地310亩^③,排名第二的种粮大户则耕作农地110亩(其中租借105亩),年产稻谷约8万斤。此外,在受访的有耕作农地的农户中,有1户自家地里年产粮只有1 400斤,不够吃,每年需外购300斤,有8户表示自家地里的年产粮主要用于自家消费,没有余粮可售。其余的农户虽然都有余粮可售,但数

① 因调查点在南方地区,其粮食产量主要是指稻谷,不包括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

②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现象,在2005年之前,绝大部分农户自家会储备至少3-6个月的家庭口粮,供青黄不接所需,但近年来,农户储备的家庭口粮呈下降趋势,有10%-20%的农户甚至根本没有储备粮,其所需的粮食多是少量地到市场购买。

③ 该大户在2009年共租赁了305亩的农地进行抛秧式规模化耕作实验,所租借的农地涉及5-6个村民小组的80户左右居民,每亩当年的年租金为300元。不过,该年度的抛秧实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成功,户主亏损约10万元。

量不多。调查中还发现,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量高峰期相比,该县80户受访农户中有55%的受访农户的销售余粮减少了,有32%的受访农户的余粮销售基本维持不变,只有13%的农户销售的余粮增加,这部分主要是一些种粮大户。从绝对数量来看,T县的粮食产量比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下降了20%以上。

类似的情况在闽西北J县和闽西的W县也同样存在。事实上,和赣北的T县相比,J县粮食产量下滑趋势更加明显,这两个县都有数以万亩计的上等农地被用于种植烟叶,W县另有数万亩的农地被用于种植花卉、仙草等经济作物。以J县A乡为例,该乡粮食产量最高是1985年,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高涨,当时政府的粮食收购部门在全乡设立了3个粮食收购点和仓库囤积点,每个收购点的粮仓都堆满了收购的粮食。在此之后,由于种粮比较收益的持续下降,再加上当地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以及烟叶种植的推广,当地的粮食产量不断下降。目前,全乡销售的商品粮不到高峰期的50%。况且,现在全乡1.22万人,常年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口包括其子女已超过5000人,这部分外出人口的口粮大部分不是由A乡的农地产出供给。以此推算,A乡粮食生产的萎缩更为严重。当地村干部测算,如果外出的5000多人全部回归A乡,则全乡现有生产的粮食只能保证全乡人口的口粮需求,基本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售。这也是整个J县乃至周边县(市)农村的普遍现象。

福建J县和W县所反映出的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也可以从福建全省粮食自给趋势逐年下降这个侧面反映出来。据2007年福建省粮食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福建全省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不足50%。全省的粮食播种面积由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平均3000万亩下降到2005年2161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16万亩,年均下降

4.24%。与此同时,该省在2000-2005年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减少5.6亿斤,年均下降3.26%。^[9]类似的情况在浙江、广东、江苏等过去的“鱼米之乡”的省份也同样存在。如广东省粮食自给率只有30%左右,浙江省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不足50%,是全国第二大粮食调入省份。^[10]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发展趋势,除了与当地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到这些省务工经商以及当地政府有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等因素有关之外,更与当地农户的种粮意愿持续低迷导致粮食产出下降有很大关系。

就我们调查的样本村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户家庭粮食产出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也有少数村庄例外。如在湖北C县和S县的一些村子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税费取消之前的这段时间内,粮食产量因为大量农田暂时性抛荒而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农业税费取消之后,抛荒的农地减少,粮食产量因此上升。

(二) 农作物复种指数降低

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还表现为农作物复种指数的下降。黄宗智在研究解放前的华北农村时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现象,由于家庭内土地数量的不足,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内卷化”^①形势日益严峻,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单一经济作物的过度依赖。^{[11]161-162}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农户对农地的“内卷化”经营达到高峰期。家庭承包制的实施,短时期内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增加投入来增加农地经营产出,农地的“内卷化”经营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不过,随着80年代后期民工潮的逐步兴起,农业生产“内卷化”态势很快即发生扭转。进入2010年前后,由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农地

① 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尼爪哇的农业生产时,格尔茨发现小农生产的投入-产出比率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状态,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理论(Geertz, Clifford, 1965,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黄宗智把“内卷化”引申为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来获得产量增长,即单位劳动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也就是无发展的增长,又称过密化。黄宗智的一些论著如《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都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观点。

经营也逐步从精细经营向粗放经营或机械化半机械化经营转变。

以闽西北J县A乡为例,农地承包制刚实施的前几年,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为了在有限的承包地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产出,A乡农户对生产条件好的农地甚至实行双季稻、油菜种植三季轮作。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农民开始寻求各种非农化的就业机会,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80年代后期,由于种植油菜的效益不高而首先被当地农户放弃。同时,在一些偏远的山垄田农户也不再种植双季稻。进入90年代,双季稻种植面积越来越少。最终从1994年开始,全乡无农户再种双季稻,取而代之的是在地势平坦的农地实行烟稻轮作。目前,该乡约有近一半农户在上海开食杂店(基本上是“夫妻店”),外出的劳动力超过一半,且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失,是该乡偏远山垄田的逐渐抛荒。同样,地处闽西W县位置偏远的Y乡某村,2009年该村全村外出人口约1200人(大多数是劳动力),约占全村总人口2405人的一半。由于劳动力短缺,该村的山垄田已经大部抛荒。对此本文随后将进一步分析探讨。

农作物复种指数下降,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相伴。在我们调查的32个村486户农户中,有超过一半的村的农户有组织性地种植某种经济作物,他们似乎在追求现金收益和追求生存保障方面寻找一种平衡。其中,种植非粮食作物一般是为了寻求现金收益最大化,而种植粮食作物则是追求生存保障最大化。如福建J县A乡大规模种植烟叶已经有20年的历史。当地没有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户中有30%以上以种植烟叶为收入来源。而在闽西的W县,当地政府也大力扶持发展农户种植烟草、仙草(王老吉公司建立的凉茶原材料基地)、蔬菜等非粮食作物,面积达4万多亩,这是当地留守家乡的农户的主要货币收入来源。由此可见,在目前农村中已经出现一种粮食种植业“副业化”的情况。相对于经济作物种植而言,粮食种植在整个家庭生计中已经处于“副业”位置,而前者则成了“主业”。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如果一个村庄没有经济作物作为农户的主要货币收入来源,那么当地

的农民要么大量外出打工经商,要么就生存于一种相对贫困状态。在湖北C县某村,当地大量的农民外出从事明矾生产行业,而留守在家乡的农户尽管把外出的农户的农地租赁来耕种,并且一年仍然种植双季稻,但所得收入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家庭平均经济收入大概只有福建J县和W县调查村的50%左右。类似的情况在江西T县和X县也基本相似。这也验证了农户的一种普遍共识,即如果仅仅是自家承包地上种植粮食作物,是无法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

(三) 农地抛荒毁坏面积增加

农作物复种指数下降为零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抛荒农地。在调查的32个村中,有28个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农地抛荒或毁坏现象,面积约占调查村总农地面积总数的3%~5%,其中最多的村抛荒的农地面积达全村总面积的65%甚至更多。特别是偏远的山区地带的山垄田,抛荒现象更为明显。

调查显示,各村抛荒的农地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永久性抛荒地,一般都是偏僻且耕作环境差的山垄田。有的村的农地因抛荒时间早而自然地“退耕还林”了。从农户的角度来看,他们再无垦复这类农地的意愿。这类抛荒地占抛荒地比例并不高。例如,福建省在90年代初期实施政策扶贫性的“造福工程”,鼓励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农户整体性搬迁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带落户。很多村庄的农户整体搬迁之后,其原先耕作的山垄田有不少也随之抛荒。以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为例,1990年,全乡的自然村共有57个,至1999年,整个乡整体搬迁的自然村达13个,约占全乡自然村总数的22%。在此之后,又有3个村庄整体性搬迁,预计未来还会有若干个人口规模比较大的村庄将整体搬迁。整体移民搬迁使得该乡抛荒的山垄田面积占全乡总农地面积的5%以上,而且基本是连片抛荒。只不过,在当地政府的统计报表中,这类抛荒地一般不会呈现出来。

闽西W县Y乡L村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该村全村2400多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出外打工,从事家禽屠宰业。全村农地面积3400多亩,现在仍在耕作的农地只有1200亩,而抛荒的农地占全村农地总数的65%。导致这个村农地抛荒

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山垄田耕作中要耗费巨大的人力成本;二是当地大部分劳动力外出从事个体性的家禽屠宰业,该行业对年龄要求不高,五六十岁的老人都可从业,因此外出的劳动力尤其多。由于本村的农地抛荒非常突出,有时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只能请人过去临时耕种。

还有一类抛荒地属于暂时性抛荒地。通常这类农地的耕作条件较好,农户对这类抛荒地仍有经营意愿,只是暂时“休耕”。在工商业经济发达的浙北A县抛荒的农地大多属于此类。该县邻近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2011年8月我们在此县的农村调查中时发现,尽管当地农地土质肥沃,但已经基本上没有农户再种植双季稻,有的农地甚至被抛荒闲置。和山区村庄连片抛荒的山垄田不同,经济发达地区抛荒地如果地处平原,往往是零星抛荒。一块地抛荒,但其周边的农地仍然在耕作。

总体而言,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的趋势越明显。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农户粮食种植意愿弱化的趋势出现的相对更晚。例如,2011年我们对赣南X县农村的调查中就发现,当地农户的种粮意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弱化倾向,他们仍然坚持用传统的人力耕作方式种植双季稻,尽管当地的农地质量总体上比浙北A县差很多。非农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使得他们仍然不得不尽力从粮食种植中获取更多的收益。^①

三、农户粮食种植意愿弱化原因分析

农户粮食种植意愿弱化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 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推理表明,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经济”向劳

动力有限供给经济转型的“拐点”。^②从2004年开始,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使得社会各界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短缺表现出担忧。^[12]从表面看,目前我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出现了低端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的情况。这点不仅可以从2005年之后城市农民工工资上涨中看出来,也同样可以从农村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现象看出来。

对农户数据统计分析表明,1986—2007年期间,我国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平均工资呈现先慢后快的增长趋势。^[12]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工资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4省32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短期雇佣的工资从2008年的50~60元/天上涨到2011年的80~100元/天。2013年我们对福建、江西、浙江、四川、广东、安徽的一些村庄跟踪调查则显示,农村劳动力价格又比2010年上涨20%左右。现在的农村雇1个男的“短工”干1天农活,酬劳平均达到100~120元左右。即便如此,农忙时节,还是雇用不到劳动力。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农户采用雇工耕作农地,则种粮基本无利可图甚至要亏损。

调查显示,从2009年至2013年的4年中,经济落后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赣东南的X县调查村为例,2011年,当地雇佣1个男劳力耕作1天的酬劳为50元,到了2013年,就普遍上涨到100元以上,上涨幅度达1倍。而在浙北的A县,2009年当地雇佣男劳动力耕作农地价格为80元/天,2013年上涨到150元左右,涨幅低于X县。这说明,劳动力短缺在农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有的学者判定“刘易斯拐点”正在离我国社会越来越近的论据所在。^[13]

其实,农户心中对耕种农地普遍还有另外一套成本核算法。他们认为,如果把自家种田所得收入平均计算,则农户自己的每个投工收入大概

① X县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因当地的农地耕作条件不利,农户耕种1亩农地,即使是种植双季稻计算,平均获得的净收益约为500元左右,相当于浙北A县一季稻的收益。

② “刘易斯拐点”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意指农业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拐点”的论述。

为50~60元。而目前受调查村庄的成年男劳动力雇佣价格平均为100~120元,比农户自我雇佣的劳动力价格至少高出1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年轻人普遍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根本原因。换言之,粮食种植业是建立在诸如老人、妇女等低价值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的,由此呈现出的粮食种植业“老龄化”和“女性化”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二) 粮食种植业比较收益下降

要客观地核算粮食种植业的比较收益,应该从农户自身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动态的核算。就我们调查的32村的情况来看,从2009年至今,农业比较收益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除了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直接蚕食了种粮的收益之外,还与粮价整体水平偏低有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定价机制仍具有政府垄断性质,国家一方面以“保护价”的名义来实行价格管制;另一方面以种粮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方式来间接扶持粮食种植业。但即便如此,粮食的定价水平与农民对农业的付出明显不对等。这种变相的剥夺感也直接弱化了农户的种粮意愿。

32村调查表明,南方稻米产区的每百斤粮食收购价格从2009年的大约100元上涨到2012年的最高140元,同比上涨约40%。^①即便如此,农户种粮的比较收益仍然呈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从2009年至今,农村雇佣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达1倍以上,这点前文已经说明;另一方面,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成本也至少增加了20%~30%。这样计算,农民的种粮收益自然是持续下降。近年来,由于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呈短缺态势,导致农业劳动力更趋紧张。农业机械化投入替代人力投入也呈加速推进之态势。当前,农户雇请机械收割稻谷,仅此一项,每百斤成本约占粮食销售价的8%~10%,因此农户种粮比较收益更为缩减。按照农户自己测算,如果尽可能用非人力(包括农业机械、畜力等)投入来替代人力投入,则耕作每亩农地一年获得的净收益平均只有100~200元,仅相

当于他们在当地干1天“零工”的收入。

四、结论和讨论

研究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正如黄宗智在研究解放前华北的小农经济所指出的,要了解中国的小农,“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11]⁵因此,如何客观地看待本文所探讨的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及粮食种植业退化议题,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农民种粮意愿高低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算计过程,而是与当地的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以及家境优越的农户而言,他们种粮更倾向于按照市场经济理性“斤斤算计”。这类地区的农户看起来更像舒尔茨所说的“理性小农”。^[14]这类农户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倾向于完全放弃农地经营。不过,对于大部分农户而言,他们种粮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首先寻求一种生存保障,其次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点似乎和恰亚诺夫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小农生产的最优化平衡点是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之间。^[15]因此,尽管目前大部分农户认为种粮并不划算,但是他们之所以仍然没有抛弃自家的承包地,其深层的原因即在于此。至少,他们认为,自家食用的粮食总要自己生产。

毋庸置疑,当前我国的农业经营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而摆在农户面前的路径似乎只有一条,即引导农户走向联合,通过促进农民农地流转,使得农地经营走上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道路。但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首先突破一个制度瓶颈。由于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主要是以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预设条件而建立的,为了保障农村“集体成员权”权益,使每

① 这个价格是以粮贩子直接到农户家中收购价来计算的,不包括国家的各种种粮补贴。

个农户都能够均等地享有集体地权权益,客观上只能以相对牺牲农地经营的经济效益为代价。尽管现行的农地制度试图通过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化甚至是固化的方式来促进农户进行现代性的投入,但可惜事与愿违。事实上,就我们调查的32个村而言,几乎每个村都已经开始出现舒尔茨所谓的现代小农经营转型的端倪,包括农机具对人力投入的逐步替代、新型农业合作社组建及订单农业发展等,但这种农业经营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脆弱且松散的细碎化的农地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对现代农业资本仍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地制度创新以改变这种局面,成为提升农户种粮意愿进而化解粮食种植业退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韦革. 粮食产量统计:用农户和田间数据说话[DB/OL]. (2011-10-18) [2013-09-10]. <http://www.zgxxb.com.cn/xwzx/201110180004.shtml>.
- [2] 唐茂华,黄少安. 农业比较收益低吗?——基于不同成本收益核算框架的比较分析及政策含义[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4): 53-59.
- [3] 刘建平. 农业比较利益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1-12.
- [4] 贺振华. 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95-102.
- [5] 朱冬亮. 土地调整: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控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2(3): 14-21.
- [6] 王琢,许浜.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179.
- [7] 陆学艺. 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1: 258-263.
- [8] 徐万山. 农村改革的微观透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5-17.
- [9] 卢兆钟,陈扬玉. 福建粮食供求趋势分析[J]. 福建粮食经济, 2007(1).
- [10] 江胜忠. 浙江粮食自给率不足一半[DB/OL]. (2011-07-14) [2013-09-10]. http://www.grainnews.com.cn/xw/news/gn/2011/07/14_95809.html.
- [11]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上海:中华书局, 1986.
- [12] 刘钧.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议综述[J]. 经济学动态, 2011(7): 94-98.
- [13]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J]. 中国社会保障, 2007(5): 24-26.
- [14]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15]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1-19.

An Analysis of Farmers' Declining Will to Produce Grains and Recession of Grain Producing ——A Survey of 346 Households in 32 Villages from Fujian, Jiangxi, Hubei and Zhejiang Province

ZHU Dong-liang, GAO Y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cession of grain producing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grain output drops because of the decline of farmers' will to produce grains. The field research proved that the recession of grain producing in China had recently got more serious and it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cline of grain output of each household, the drop of multiple-cropping index, and the abandonment of some farmland. The causes for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above included the rise of labor cost, low price of grains, rapid urbanization and so on. The solution to this situation is to reform farmland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farmers' will to produce grains.

Key words: will to produce grains; grain producing; survey

(责任编辑 杨中启)